

新中華叢書

學術研究彙刊

科學、自由與和平

赫胥黎著
任道遠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SCIENCE, LIBERTY AND PEACE

by

Aldous Huxley

科學、自由與和平

新中華叢書

學術研究彙刊之一

赫胥黎著
任道遠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新中華書局科學、自由與和平（全一冊）

Science Liberty and Peace

◎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郵運國費另加）

原著者

Aldous Huxley

譯者

任遠道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譯者弁言

本書爲現時英國著名作家赫胥黎 (Alfred Huxley) 先生所撰，由倫敦 Chatto & Windus 書店在去年春間出版。

作者在本書內，痛詆充溢着全宇宙的集權哲學，還指出科學進步的結果，無非增強了少數統治者的權力，而犧牲了大多數人類的自由與獨立。現時代的集中金融、集中工業、集權政府和統制政策，在在約束個人的自由。各國人民都在崇拜和盲信着國家主義，各國政府之間發生權力的衝突，還有科學上的一切新奇發明，這些都是促成國際戰爭的重大因素，以致世界和平感受威脅。作者針對着現實，極力主張地方分權的理論與實施，使得人類在經濟和政治上，重獲自由與獨立；並且還希望科學家，今後以消極地不去參加以屠殺和奴役人類爲目的的工作，積極地去發動許多造福人類的活動。

今日創論地方分權學說的呼聲，雖極微渺而被人蔑視，可是這畢竟是一種呼聲。把這種理論提供實施方案的，在英國有韋洛克 (Welfred Wellock)，在美國有鮑沙第

(Ralph Borsodi) 和「般替」自由美洲雜誌」(Free America) 撰稿的作家。

譯者原爲「新中華雜誌」譯述本書，茲值發刊單行本，用誌數語，以饗讀者。
老友陳伯吹先生，對於本書出版事宜頗多相助，誌此以示道謝。

任道遠

三十七年四月廿三日於上海

科學、自由與和平

「倘使社會的佈置是壞的（好像我們社會所佈置的那樣），並且少數人握有統治多數人的權力，還要壓迫多數人，那末，人類對於大自然的各種勝利，將要無可避免地增長那種權力和那種壓迫。這正是目前實際上所發生的事。」

自從托爾斯泰（Tolstoy）發表上面的一段文字以來，差不多已有半個世紀；五十年前所發生的事，確在繼續地發生着。在這近五十年間，科學與工藝學已有顯著的進步，可是，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的集中，也增進了，寡頭政治和專制主義也增強了。我們可以不必說，科學不是包含在這個進行中的唯一因素。因為沒有一種社會罪惡可能地祇有一個原因。所以在任何一種情形下，要尋到一個完全的治療，就很困難了。在這裏我們能夠斷言，進步的科學是造成二十世紀中發生的自由漸趨墮落和權力漸趨集中的許多因

素之一。

應用科學對於個人和社團的生活所接觸的範圍與關係是廣泛異殊的，因此，隨着應用科學增長，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權力所用的方法，也就愈衆多而繁複了。在下面各節裏，我要把這些方法中較爲顯明重要的列舉出來；也要說出應用科學怎樣促成權力集中在少數統治者的手裏，還用了什麼方法；也要指出這些趨勢怎樣遭到抗拒，在什麼方法下遭到；還有這些趨勢最後怎樣，或許會得反轉來。

一、在過去兩三代的過程中，科學和工藝學替一般控制各種國家政權的政治首領，裝備了空前有效的壓迫工具。坦克車、火焰噴射器和轟炸機，祇這少數的幾種工具，已使民衆叛亂的故技變成毫無意義。同時最近運輸和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改進，足以極度加強了警察局的手段。曾任法國治安部部長的福山（Fouché）公爵，就他一己的特殊作風來講，是位具有頭等才幹的人物，如果要同現代獨裁政權和民主政治所指揮的祕密警察力量加以比較，那末福山能夠替拿破崙所造的壓制工具，已成了一套荒謬笨拙的機構。過去，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大都依靠政府的缺乏效能。壓制政治的精神常常是非常迅速

的，但是它的組織和物質配備常常是懦弱的。進步的科學與工藝學把這種情形完全改觀了。今日倘使中央行政長官希望採取壓制行動，他就找到了近乎有神效的強制機構已準備着聽他指揮。靠着極有訓練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冶金家和機械發明家的天才和協力勤勉，專政者就能夠鎮壓更大數目的人民，戰略家就能夠較過去更無差別地並在更大距離內進行屠殺和毀滅。在許多方面大自然確被人類克服了；但是，正如托爾斯泰所先見的，人類和他的自由却遭受繼續失敗。

勢不可當的科學和工藝學的優越，就它們本身的立場講，誰也不能加以拒絕。在一八四八年的時候，遊獵的鎗足以匹敵兵士所用的小鎗，用推倒的馬車、沙袋和鋪路石頭所築成的一個防禦，已足夠抵禦騎兵和從砲口裝彈藥的大砲。經過一世紀的科學和工藝的進步，凡是大衆百姓所可利用的武器，都不能同少數統治者管理的兵工廠的武器相競爭。結果，大多數人對少數人如果要發動反抗，那種反抗的發動必須不在工藝優越的範圍以內。在許多國家裏，民治制度已經確立，行政長官準備堅守民主事業的法規，大多數人可以得到保障，來抵抗統治的少數人，就是利用他們的權力來投票選舉，來罷工，

來組織緊急的集團，來向立法機關請願，來開會，還進行新聞運動來贊助改革。但是在沒有民治制度的地方，或是在至今存在的民治政府久已拒絕履行民治法規的地方，一羣感到本身受壓迫的大多數人，也許要被迫採取直接行動。因為科學和工藝學克服大自然，就極度增強了少數統治者的軍警力量，如果這種直接行動是強烈的，難以希望有成功的結果；爲了在任何武裝衝突中，擁有坦克車、飛機和火焰噴射器的一方，不會得不擊潰至多不過配備着小武器和手榴彈的另一方面。

在羣衆所處的那種依靠應用科學的不利的政治情勢中，還有什麼方法嗎？至今祇有一種有希望的成果被人發現。在南非洲，後來在印度，甘地和他的附從者遭遇到備有優勢軍力的壓迫政府。甘地不但是一個理想家和有節操的人，並且也是一位極實際的政治家，他組織一種不用暴力的直接行動，這就是他稱做「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想用來對抗這種似乎絕望的形勢。關於不合作運動的方法和結果的詳細報告，讀者可參閱希里達賴尼(Krishnaiah Shridharani)所撰「非暴力的戰爭」(War without violence)一書。此處祇須說明的，就是不合作運動的方策，抵抗在軍事方面的絕對優勢，造成了

許多顯著的成功。一般人認為甘地所成就的事績，對於工業的西方所有歷史和心理上的情勢，不會發生關係的，那末希里達賴尼先生要對這些人作下述的答覆：

我和西洋接觸以後，覺得和一般的認識相反，經過自覺和熟慮所採用的不合作運動，在西方比在東方有着更多的肥沃田地，來供給它生長和繁榮。不合作運動好像戰爭一樣，欲求工作成功，也需要公德心、自我犧牲、組織和訓練，我還感到這些特質表現在西洋社會裏，要比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裏來得多。最優秀的暴行技術的工匠，或許仍舊是非暴行的直接行動的最有效指揮者。用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話來說，這祇是『製造意見的人們奪取歷史機會』的一個問題。

有人往往要說，不合作運動不能抵抗一個組織，它的領袖們準備毫不悔恨或顧忌地利用他們軍事上的優勢。當然這種情形或者會如此的。不合作運動不能比任何他種用暴力的或不用暴力的政治行動保證取得較多的成功。但是當它抵抗全然殘忍而狂熱的敵手的時候，雖然不合作和沙羅（Thoreau）所稱做「文明的反抗」，連帶着有紀律地甘心接受犧牲的痛苦，甚至甘心追求犧牲的痛苦，也許都證實是無效的，可是用不合作運動

所造成的情勢，實質上不會比消極地接受或無益地武力抵抗那種不堪壓迫所造成的結果要更壞的；同時在心理上和道德上，不合作運動的結果大概會更加有利，對那些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人是有利，並且在旁觀者和僅僅間接聽到不合作事業的人的心目中，也是有利的。

在當前幾年裏，不合作運動或許會在西洋生了根，這也似乎是可能的，所以生根的原因，主要地並不爲了任何心理改變的結果，但祇是因為它能把唯一可用的政治行動來供給羣衆，尤其是在被征服的國家裏。一九二三年在魯爾（Ruhr）潑辣鐵納脫（Belgium）兩地的德國人，憑藉了不合作運動來抵抗法國人。這次運動是自然發生的；在哲學上倫理上和組織上，這次運動確並未預先準備。爲了這個理由，這次運動最後便失敗了。但是這次運動已維持了相當時日，足以證實最深受軍國主義教訓的西洋民族，完全能夠勝任非暴行的直接行動，還能夠愉快地接受犧牲的痛苦。在被征服的德國人民中，同樣的不合作運動也許再要開始（不過這次他們自己會更加自覺，並且更有準備）。因爲任何其他一種的政治行動都感不適用，所以這種運動遲早將要發生，也是極可能的。

事。如果出產克勞司維資（Klauswitz）貝納地（Bernhardi）和希特勒（Hitler）的一個國家，遭受環境逼迫而變成非暴行的直接行動在西洋的第一個大規模表演者，那是歷史上更快樂的許多諷刺之一。在這個科學進步的時代裏，非暴行的直接行動已成為人類唯一切實的方法，用來代替絕望的革命和自愚或自殺的戰爭。

二、文字與言辭兩者同武力至少是一樣強大的；因為，武力的指揮要服從言語與文字。進步的工藝學已增強了那些力量，它不但供給了更大更好的壓制工具，並且還供應了較早年統治者所使用的有無比優良的說服工具。輪轉印刷機和最近的無線電，對於集中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有着大的貢獻。詹姆士米爾（James Mill）深信着，當每個人都學會了讀書，理智和民主政治的統治也就永久地得到保證。但是在實際的歷史事實上，免費義務教育的普及，隨着還有舊式印刷術的減價和加速，幾乎到處便犧牲了羣衆而增強了少數執政者的權力。這件事的理由是明顯的。兼備吸引力和廉價的報紙就不能產生，倘使這份報紙得不到登廣告者（他們就是控制集中的金融和大規模大量生產與分配的工業的人）的資助，或者得不到爲了本身目的想支配輿論的某組織的補助，或者得不

到中央政府的津貼。在新聞紙認為自由的國家裏，由登廣告者主要地資助報紙，還有政黨和金融的或職業的團體作較少的補助。在新聞紙不自由的國家裏，報紙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津貼。負擔經費的人往往就是指揮發令的人。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流行的報紙支持它的許多登廣告者，便來宣傳集中的工業和金融的利益，連結了足以使這些組織獲利的集權政府。在全能政治的國家，一切報紙都在宣傳政府全能的力量，還頌揚一黨政治和國家統制一切。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進步的工藝學加強了地方政黨領袖的勢力，因為工藝學供給他們說服民衆的工具，使民衆深信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集中是為着公衆的利益。

新聞紙所有的真實情形，也是同樣地適用於無線電。言辭要比印在紙張上的文字更動人的。古時一個偉大的演說家所能達到的，至多不過幾千個聽衆。今日依靠了應用科學，有口才的獨裁執政者能夠把感動的好消息傾倒在幾千萬人的耳朵裏。安托尼（Anthony）對包圍該撒（Caesar）屍體的暴民所能做的事，現代像安托尼的人就可向全世界做這種事了。如此少數人對如此多數人作如此強大的支配，也是空前未有的事。

倘使出錢宣傳的人，既不改變他們的目的，又沒有抱其他目的而願意出錢的人來替換他們，那末，不希望的宣傳將要不會停止。同時要想補救這種壞事，除掉個人克己以外，簡直沒有別的方法。讀報和聽無線電都是心理上的嗜好，心理嗜好好比犯麻醉藥、烟草和酒的生理嗜好一樣，要終止它的話，祇有嗜好者本身自願努力。人們愛讀報人和離婚的新聞，愛看報上連貫的滑稽畫，或是愛聽諂媚的歌劇和興奮的音樂，當他們屈服於這種種心理嗜好的時候，他們必須希望着要受到這種宣傳的影響，因為那種宣傳往往隨着這些養成習慣的刺激一同來的。紐約工會的領袖們，最近向它的會員提出關於閱讀習慣的一套問題。下面便是所提問題中的二個：你們正常閱讀那一種報紙？你們承認那一種報紙是最不可靠而最不真實的？百分之六十的會員都同意着甲報為紐約區內最不真實的，但是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會員都承認甲報是他們日常的讀物，因為甲報有着優美連貫的滑稽畫和更激烈的投時好主義。這是『見善者而嘉許之，惟擇不善者從之』的一樁尋常事件。在目前的情況支配下，除掉讀者方面克己以外，簡直無法可以減削甲報的影響。人們繼續放縱於心理嗜好，必須償付代價，那種代價便是不希望的宣傳。

三、應用科學對統治的寡頭政府，供給了許多更有效的壓迫和說服的工具，它已經助長了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掌裏。但是它對這個相同的目的，還給與各種重要的間接幫助。這些間接幫助可分兩方面來講：第一，在極大的農工業的經濟範圍內，倡導了大規模的大量生產和分配的方法；第二，就在它的進步中，創造一種經濟和社會的不安全，這種不安全感足以驅使一切有關係的人——主人、經理和工人——都要尋求國家性質的援助。現在我們願將這兩種集權的因素作更詳細的討論。

(1) 當發明家和技術家應用不偏私的科學研究之結果的時候，他們把大量生產和分配的昂貴的機器，配備到大公司裏去的問題，加以非常注意，至於用那種便宜簡單而有效的生產工具，去供應個人或合作集團，爲了維持他們自己的生計，和適應本地市場的需要等問題，却是不大注意了。所以造成如此的理由，就是替大量生產者和分配者做工作，可得到更多的錢，大量生產者和分配者有看更多的錢，因爲金融家們看到在集中的生產制度裏比在不集中的制度裏，他們要獲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權力。

我們在此也要認識，金融力量的集中，是在十八和十九兩世紀的科學革命以前。使

我們的工業文明在過去和今日都變成令人憎惡的東西，也應該由集中的金融力量負起大部分的責任。全歐洲的土地和自然財源，既不全然為小耕農羣的人民所有，又不為國家元首的財產，拿來出租給小佃戶們，而把社會利潤性質的租金用在許多社會的目的上。大部分的土地和它的自然財源，成為一個小的地主階級的專利品，地主們將應該屬於大眾財產的社會利潤據為己有。因此早年集中的金融力量，利用了新工藝學上的發明，並不為着個別的生產者的利益，却為了單獨擁有積資的一個階級的利益。集中金融產生了集中工業，並且在相當時期以內，集中工業的利潤增加了集中金融的權力，所以集中的金融力量，就能夠在完全集中的生產和分配的一個方向，常常更遠地進展了。

在大量生產的大工廠裏，工業性能的集中，結果造成了城市裏大部分人口的集中，還使數字永在遞增的許多個人，陷於完全依靠少數私人資本家和他們的經理，或者完全依靠一個公共的資本家——國家，這個由政府客來代表，而由文官來工作。時至今日，國家控制的各種企業，精密地摹仿資本家的大企業。收歸國有的工作，並不在土地和自然財源方面停止，可是把土地和自然財源收歸國有的目的，又不在使個人和合作集團能夠

自由接近小規模生產的方法，接近個人自由和自治。相反地，收歸國有的目的，除掉土地和自然財源以外，還包括着生產工具，那種收歸國有辦法的進行，目標便在增強國家（就是指暫時執政的政客）的勢力，來抵抗它的人民，和解放個別男女脫離在經濟上依賴操縱者的宗旨，一點也不符的。但是對於操縱者的經濟依賴往往是壞的，因為很明顯地這種依賴同地方的和職業的自治，或者同公民的和個人的自由，都不容易相互調和而一致的。民治制度或許會得充分地運用，就要在這些時候和這些地方，至少有大部分的公民，都得到足夠的土地，並且都有足夠的工具和專門技能，不用去依賴有經濟勢力的私人資本家或政府，而能夠維持他們的生活。好像在現時代的西洋各國，大多數公民都一無所有（即使一技之長也沒有，因為運用半自動的機器，並不需要一種技能），個人的自由，還有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大概都要依靠資本家的或是國家的主人和經理所施與的恩惠，還要依靠這些主人和經理履行民主法規的意願，這些主人和經理就是把握了一切生產和分配的工具。沒有財產的工人，要想促進他們的利益，並保障他們自己去反抗壓迫，就組織了工會。這些工會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來制止資本家的野心和貪慾，